**论毛主义党**

**文|阿吉特**

（作者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

于2016年被印度政府逮捕并关押于狱中）

**译|Shola-e Javid**

一个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新社会和全人类而奋斗的先锋队的组织的品质（qualities），以及它的党的建设方法是什么？这样的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是什么？在今天，一个共产党能在不成为毛主义党的情况下保留它的共产主义品质吗？毛主义党仅仅是共产党的另一个名字吗？或者说，它在性质（nature）和工作方法方面包含了什么新内容吗？

在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或其中的阶层）主要是通过政党（一种社会组织）这一工具来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利益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进行与敌对阶级的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这一科学理论是由列宁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确立的。列宁主义政党概念的核心是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并以此为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有人批评这导致了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精英的产生。此外，列宁关于工人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获得指导他们解放的思想体系的观点，以及他提出的必须从外面将阶级政治意识灌输给工人的主张，被认为是在对精英主义敞开大门。列宁主义政党概念被指责为低估工人潜力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达。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列宁还活着，这一政党概念的弊端就会被列宁的崇高个人品质所遏制，而不会像在斯大林的残暴统治下所彻底暴露。（皮尔森, 《Mathrubhumi》– 87/3, March 29, 2009）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在列宁主义政党概念的形成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吧。它的出发点是俄国共产党（当时还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章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右派（托洛茨基也是其中一员）指责列宁的党章草案促进了极端集中制。

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列宁所坚持的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党的组织中进行工作的入党标准，也是不受欢迎的集中制的一个例子。而右派则建议允许任何帮助党的人成为党员。因此，他们将使党成为一个由业余活动人士组成的松散组织。这就是列宁和他的对手分歧的关键所在。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组织那些准备在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中成为积极活动家的人，那些毕生致力于这项事业并因此得到必要的领导素质和技能的人。他的政党概念就是从这一构想（vision）发展而来的。沙皇俄国的具体情况排除了一切公开活动的可能，同时必须不断躲避秘密警察，这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从列宁坚持党的中央机关享有完全的集中制，以及在党的不同委员会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极严格的分工——几乎像现代工厂那样的分工——便可以看出这些特殊性的分量。但也必须指出，这种方法隐含着对第二国际的政党概念的背离（departure），尽管它所涉及的直接背景是俄国的情况。这就是列宁在党的问题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同的地方。撇开顽固的右派的攻击不谈，让我们通过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他也曾在革命阵营中待过一段时间）的批评来阐述这一点。

卢森堡认为列宁是俄国革命运动中“极端集中主义”倾向的代表。这一批评是建立在她关于革命群众运动与党的关系的观点基础上的。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为一种**倾向**，它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1；“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原文强调）这种叙述强调了共产党集中制的自愿性，或多或少地否定了阶级与其先进分子之间的差异，党与广泛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差异。虽然卢森堡使用的词是“自我集中制”，但实际上它成为了“自发”的同义词。这种划分的细化也可见于托洛茨基的主张，“如果说分工能够被看作是**组织原则**，那么这仅仅对手工工场适用，而一般地说对一个政党，尤其对我们的政党是不适用的。对于一个本身的任务就是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组织来说，分工的‘原则’绝不能代表它的特点，这难道不是任何人都很清楚的吗？”3。（《我们的政治任务》，第三部分-组织问题，原文强调）

列宁并没有否认党的集中制的自愿性。它不是强加的，而是大家都自觉地抱着革命的利益去加入的。这就是列宁的自愿性集中制的概念。卢森堡的“倾向”必须通过斗争的过程来实现，与之相反，对于列宁来说，集中制的党的方法，包括它的任务分工，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自觉地确立和进行训练的。然而，这并不否定革命自发性的积极作用。

重复一遍，列宁的出发点是组织的需要和组织并进行革命。他通过分析敌人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从一些革命或无产阶级及其发展的主观见解出发，得出了解决办法。因此，在1905年的革命动乱中，列宁主张能够容纳最大多数的激进工人阶级群众的各种组织形式，而不是拘泥于他之前一直支持的最严格的集中制和对招收党员的审慎态度。（《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列宁全集》第8卷4，209-220页）

这不是列宁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例子，它**就是**列宁主义**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这样一种分析为指导，即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群众的革命热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弱点。这表明了对群众的深厚信念，以及对革命运动中自觉步骤与自发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把握。毫无疑问，列宁主义的集中制和组织原则并不是在“任何阶段”都要执行的绝对概念。它的工作分工没有放弃提高全党意识和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意识的任务。

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放松（loose）了列宁对他所制定的先锋队概念和组织方法的模范的、辩证的处理？关注这些差异，而不是像皮尔森那样追逐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将会更有利于革命运动。列宁担心将布尔什维克党的章程不顾时间地点的普及化所带来的危险。在给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列宁注意到它的组织原则具有浓厚的俄国味，并怀疑其他国家的同志是否能够正确地掌握它（《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3卷5，第415-432页）。在那些急于与第二国际松散的组织方法决裂的日子里，这种关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要求俄国共产党更加严格的集中制，此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执政党。党的铁的团结对于革命国家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背景下，俄国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脱离现有做法，结束党内派别以及他们的出版物。后来，这一方法成为共产党组织原则基础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列宁、俄国党和共产国际都认为西欧即将发生革命性的进展。各国的政治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的迫切性肯定已经影响了组织原则的制定。但是，正在形成的革命形势消散了。在这一点上，列宁提请注意，在退潮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彻底的分析，以便制定未来的步骤。但在他还没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就因刺客的子弹卧床不起而去世了。目前尚不清楚政党概念和组织原则是否在他考虑和思考的问题之列。无论如何，这不是后来看到的那种，以一种非常机械的方式被理论化的在特定情况下通过的法规和工作方法。

斯大林的统一的党概念在他的机械错误中尤为突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遵循的模式——直到它被毛批评。把党崇拜为不容质疑、永远正确的力量（Power）的观念得到了加强。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机械思维的影响，在斯大林的政党概念中是显而易见的。党没有被理解为作为一个有机的实体的，必须通过与外部和内部矛盾的斗争来不断更新其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和相关性（relevance）的一个活跃的矛盾空间。思想斗争变得正式化了。民主集中制出现了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的萌芽。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执政党和那些为之奋斗的政党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在敌人的镇压下维持生存的必要性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人民。对这些问题的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斗争，活跃了党内气氛。然而，统一的党概念的束缚始终存在。与思想上的整风相比，清洗党员获得了更突出的地位。只要党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这通常意味着把那些失去共产主义品质的人清洗出去。但即便如此，意识形态在整个过程中仍退居二线；组织方面走上前台。

毛打破了这种消极的传统和它背后的机械思维。这实际上是对先锋队概念的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它开辟了一条使人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列宁主义政党有了更深入、更丰富的认识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毛存在着对政党概念的背离的思想。他在1927年写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指出，任何不能领导起义的农民的革命党都将被抛弃。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被认为是落后的农民将考验和决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的说法，只不过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绝对主义思维的大胆颠覆。它为质疑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导作用和先锋队概念提供了空间。

虽然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将是摧毁资本主义（它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的重要盟友，但他们不能提供领导。在每一种情况下，解放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在无地农民的情况下，土地；对达利特人6而言，种姓压迫；对妇女来说，男权沙文主义；对阿迪瓦西人7的民族压迫，对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压迫，对少数民族的宗教迫害，等等。具体地说，在整个革命方案的背景下，这些也是部分的。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情况。资本主义的奴役不同于早期的剥削制度，如种姓-封建制度。除了饥饿的痛苦，它没有对工人施加任何其他的强迫。而且，由于形式上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不可能有适合他们的具体解放。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都必须结束。因此，全人类的解放成为这个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源于这种客观的社会地位。它迫使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直到实现一个摆脱剥削的世界。

如果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被绝对化，必定会导致物化（reification）。（Sandeepan，《Munnaniporali》，13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都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先锋队这一机械公式如何出现。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经常看到的经济主义趋势，修正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消极性，强化这种经济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以及劳动和工作场所性质的变化，都产生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观念。无产阶级主导作用的概念在身份政治的潮流中被剥夺，他们相信，在未来，这些运动将引领社会变革。

因此，我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物化，自私地高举着这面旗帜，将眼前的绳头小利视为长远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昏昏欲睡的恳求将我们的目光缩小到局部，放弃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的崇高使命，因为这只是一个神话。毛主义突破了这一恶性循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共产党的先锋地位，是历史环境所蕴含的潜力。这只有在特定社会的历史时刻，通过创造性的干预才能实现。和其他现象一样，这也是一个对立统一。这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的警告的意义所在。

在毛泽东的观察中，人们看到了这种连续性，50年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通过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在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得出这一结论，以防止它的出现。斯大林的统一的党概念无法理解这一点。毛泽东所谓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与资产阶级代理人可能渗透共产党和腐化党员不同。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试图通过清党来检查的。毛正在谈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是资产阶级法权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和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政治/统治主导作用的产物。它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素。反对这一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将是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处理继续革命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多重任务。如果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掌握了领导权，那么资产阶级将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党和国家的颜色会改变。

这就提出了共产党的先锋队地位的又一种辩证法。我们上面看到的潜在危险的主要来源不在于外部影响。它就包含在它所领导的革命中，它所创造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就是在它作为先锋队的成功夺取政权所带来的新的对立统一的涌现中。这种潜在危险是与领导走向共产主义的潜力相反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走向哪条道路，是党和社会在每个具体历史时刻发生的阶级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把党理解为对立统一，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牢固树立毛主义政党概念的断裂（rupture）的关键点。

毛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吸取教训，阐述了许多关于党的主张。始终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意识，检查党群关系、领导和队伍中的优越态度。这并不否认领导的作用或重要性。毛反对一种使群众和阶级成为服从者和被动的工具的专制化领导观点。他提醒共产党人，无论干部多么必要，群众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夸大干部的作用是不行的。在中央与下级委员会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他始终坚持这一点。在缺乏下级信息的情况下，中央领导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有时可以在下级本身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一点。这种对毛的观察推翻了领导是永远正确的观点。这还有助于揭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毛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因素。它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在20世纪50年代，他警告说，既然夺取了政权，人民就会教训那些认为自认为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他主张人民罢工和抗议的权利，说共产党需要吸取教训。（《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自下而上的斗争的重视，这是人民自发的首创精神。这种对自上而下的有意识的干预和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压力之间辩证关系的把握，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间隔期中缺席的列宁主义理解，不只是被毛重新夺回，他还把它运用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中，把它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因此，毛发展了政党概念，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政党概念：不是基于某些个人行为特征，而是坚实的思想政治原则。

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这种对政党概念的新发展？这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条目，用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下出现的国际运动，或者在90年代的声称更加明确的毛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和实施了毛主义政党概念。中国党是在共产主义模式中锻造出来的。在寻求我们的问题的答案时，必须牢记这个方面，以及它的长期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风格的背景。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毛从一开始就背离这种模式。但是他的新方法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事实上，毛关于党的教导直到1973年才被系统地汇编在上海文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认识》中。（三年后，对这本书的禁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首批行动之一！）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党是一个按照毛主义的方法进行改造的党，但这个过程本身却有很多不平衡。事实上，这种新的方法是通过领导革命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从其经验中吸取了新的见解。

但这并不足以标明这个由条件强加的限制。这里还有共产国际方法的不完全断裂（incomplete rupture）的问题。其中，围绕毛建立起来的狂热崇拜值得特别关注。这种个人崇拜是由斯大林发起，并完全反对列宁的观点的。当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意识形态基础时，毛打着批评个人崇拜的旗号，开始为斯大林辩护。但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来完成的，区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需要考虑这是否完整。个人崇拜在马克思主义中永远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毛没有完全拒绝他们，而是限制自己批评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虽然这是通过诉诸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来寻求理由的，但它本身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问题不在于赞扬的程度，甚至不在于某人是否值得被赞扬。这种狂热崇拜培养了一种个人、领导层和党的绝对正确的观念；这是被毛主义政党概念所拒绝，但在中国党的形容词“永远正确”中可以看到的观念。当代的例子，一些毛主义党通过引用毛来证明他们对领导的崇拜是正当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在这个问题上实现清晰的必要性的认识的关注。

总的来说，毛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共产党的概念（concept）？毛主义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和领导共产党？虽然没有人能够将从与群众待在一起并为他们服务而转变为凌驾于他们之上进行理论化，从而合法化。但我们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对党的盲目信仰而不是对党的忠诚，对领导层和个人崇拜的绝对正确的盲目信念，对反对和批评的不容忍，并实用主义地支持任何方法，只要他们是“为党和革命”——这样的共产国际主义（Cominternist）影响常见于工作方法和方式。使用“共产国际主义”一词是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错误。而且，它们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整个时期的问题。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存在观点和发展的问题。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传播，促进了共产党的形成，并形成了真正的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时代。毛主义取得的巨大飞跃之一就是它与共产国际时期的不良传统的断裂，而丝毫没有减少它的积极作用。这必须进一步深化。毫无疑问，今天的毛主义党是昔日共产党的继承者。但他们的基础必须是毛主义在先锋队概念中所达到的高度，而不是照搬过去的方法和观点。

**译者注：**

1《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22页。

2《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20页。

3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18页。

4 中文版《列宁全集》第九卷。

5 中文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

6 被剥夺了任何种姓的贱民。

7 印度的原住民。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97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页。